

江西

历代作家作品选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 历代作家 作品选

蒋克己 选注

B441.83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南昌



B

535565

江西历代作家作品选

蒋克己 选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27·625 插页0 字数45万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统一书号：10110·469 定价：7·00元

前 言

江西风有“雄州雾列，俊采星驰”之称。物产丰美，人文兴盛。文学就是其中一盏熠熠的明灯。

纵观两千多年的文明史，江西文学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一 两汉、两晋时期

这是江西文学的开始时期。它包括秦汉、魏晋和南北朝近八百年的历史。这时期的文学巨匠和杰出作家是陶渊明，文学的主要样式是诗。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开始，九江郡，西汉改为豫章郡，就是最古的江西，历时二千二百年。在西汉以前，江西还没有出现过象屈原、司马迁这样千古不朽的伟大作家，甚至连宋玉、贾谊、司马相如那样才华横溢的作家也不曾有。东汉中叶，南昌有个唐棣，字子产，著有《唐子》二十八篇。这就是江西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但他与班固相比，还是远不如其成就之高。到了建安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是“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尤其是曹植，其次有以王粲、刘楨为代表的“建安七子”，同时蔡邕之女蔡文姬以女作家的姿态，异军突起地出现在文坛上，而江西此时还没有能与她们媲美的作家。东晋初年，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的陶侃（257—332），

字士行，以江州刺史和都督八州军事的将领，在江西文坛上留下了文集二卷（今已佚），今存临终前作品《逊位表》是他的代表作。残篇《相风赋》，载入《艺文类聚》。但他毕竟是军事家，文学成就^①不算高。后有南昌的熊远（？—约332），字孝文，著有《御史大夫文集》十三卷，有一定文学价值。这个时期主要的代表作家是东晋后期的全国杰出的伟大诗人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名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得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陶侃曾孙。他奇峰异突起屹立在江西文坛上，为江西树立了第一面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旗，从此，江西文学跨入了全国先进行列。他的作品充满着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恨和不与同流合污的精神，因不满于黑暗现实，坚决去职归隐，一边躬耕自食，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成为我国古代田园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影响文坛达千百年之久。在艺术上，平淡爽朗，质朴自然，语言极为精炼，独具风格。他的散文名篇《桃花源记》，描绘一幅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图景，千百年来吸引着广大读者。主要著作有《陶渊明集》十卷，今存诗一百二十余首，散文六篇，辞赋三篇，韵文二篇等。但他的作品中也表现出顺随自然、避开斗争、乐天安命的思想，对后代有过消极影响。在这面大旗的感召下，江西文坛层出不穷地出现过成批作家。南朝宋时南昌的雷次宗（386—448），字仲伦，著有文集二十卷，另有《豫章古今记》三卷，其卷幅之多远远超出江西前人。

二 唐、五代时期

这是江西文学的发展时期。它包括隋唐、五代三百八十年的历史。这时的文学主要样式除诗以外，同时开始出现了小说

和笔记小说作品，但尚未出现全国著名的大作家。

这时期，江西形成了一个大型诗人群。主要诗人有：奉新的刘春虚，字全乙。上饶的吴武陵（？—834），原名侃。波阳的陈陶（约812—885前），字嵩伯。宜春的卢肇，字子发；郑谷，字守愚。广丰的王贞白，字有道。高安的沈彬，字子文。乐安的孙鲂，字伯鱼。九江的舒元舆（？—835）。南昌的施肩吾，字希圣；来鹄（？—约883）；王定保（870—954？）等。他们都有一定数量和相当质量的作品，多的如卢肇，有诗文集十三卷，赋集八卷，相传小说《逸史》三卷也是他的作品。他们成就高低各不相同。刘春虚的《阙题》、陈陶的《陇西行》、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和《鹧鸪》、沈彬的《吊边人》、来鹄的《云》等都是当时的名篇，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他们的诗作多收入《全唐诗》中。舒元舆又是散文家，是唐代古文运动后潮的重要作家之一，《全唐文》收其散文一卷十六篇，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他擅长艺术性杂文，讲究形象化，与当时古文家以议论见长不同。他又善于描摹景物，以细腻文笔刻画出景物的特征，表现出他的独创性。王定保是笔记小说家，著有《唐摭言》十五卷，多收入《太平广记》中。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唐代贡举制度及其有关的逸闻轶事，尤其可贵的是保存了不少别集失载的唐代诗人的零章断句。是作者晚年的作品。全书多注重刻画人物，语言生动，文字简练。

尤其可喜的是，女诗人开始登上文坛。尽管她们还比较幼稚，甚至自己也并未意识到要成为诗人，只是有感而发，写出了有限的一些作品，因而无法与大家相比，但她们都是女中豪杰，不可忽略。其主要代表诗人有波阳的程长文和袁州的彭仇妻张氏。她们的作品都是自身生活的写照，显得真切动人。尤

其是程长文，她的《狱中书情上使君》是代表作，全诗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表现诗人不畏强暴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女英雄形象。《全唐诗》中都载有她们的作品。她们的出现，无疑更为江西文坛增添光彩。

从以上情况，可见这时期的江西文学已有相当的发展。尽管还没有出现韩愈、柳宗元和李白、杜甫、白居易式的大作家、大诗人，但毕竟有不少诗人在全国初具名声，为江西宋代文学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唐代是高度统一的强大封建帝国，疆土辽阔，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文化交流频繁，是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繁荣发展的良好土壤。这是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发展的前提。其次，是国家统一，带来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先进文化传入南方，促进了南方文化的迅速发展。其三，是封建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尤其是以文词取士政策的施行，大大加速了文学的发展。进士考试看重文学辞章，使大量普通地主活跃在文坛上。如刘眘虚为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吴武陵为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进士，卢肇为唐武宗会昌三年（843）进士第一，郑谷为唐僖宗光启三年（887）进士，舒元舆为唐宪宗元和八年（813）进士，王定保为唐昭宗光化年间（898—901）进士等，他们都是通过文学之路考取进士的普通地主阶级文人，并非靠世袭封官的，这自然是唐代文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南方文化的发展还远远赶不上北方，全国文化的中心仍然长期在北方（如陕西、山西、河南），大作家、大诗人仍然多出自北方（如初唐四杰中的王、杨、卢、盛唐的李白、杜甫，中唐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等），而南方却较少。江西更是如此。

三 两宋时期

这是江西文学的黄金时代。它包括北宋、南宋三百一十多年的历史。全国许多著名的文学大师和旗手、大作家、大诗人、大词人、小说家、散文家都先后出现在这时期的江西文坛上，如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洪迈、朱熹、杨万里、文天祥等。他们是这个时期江西文坛最卓越的代表作家。这时期的文学样式也极为丰富多彩，不仅正宗的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词尤其达到了绝后的艺术高峰。小说和笔记也空前繁荣，各种内容和形式的笔记层出不穷，出现了全国篇幅最长、内容最广、规模最大的笔记小说集《夷坚志》。散文的最高成就也出现在这时期。除戏曲外，各种文学样式的成就再也没有超过这时期的。

从作家队伍的形成来看，这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因血缘关系而形成一家几代人的作家团，如宜黄的乐史、乐黄目父子，临川的晏殊、晏几道父子，南丰的曾巩、曾布、曾肇、曾纘、曾惇、曾协等祖孙三代，新余的刘敞、刘放兄弟和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临川的王益、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雱等三代五王和谢逸、谢薖兄弟，修水的黄庶、黄九鼎、黄庭坚二代三黄，南昌的洪兴、洪刍、洪炎、洪羽兄弟四洪，波阳的洪皓、洪适、洪遵、洪迈二代四洪，婺源朱松、朱熹、朱熹两代三朱，金溪的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三兄弟，庐陵的李洪、李漳、李泳、李渐、李淦五兄弟，等等。这种现象在江西文学史上是特有风味的。它的出现和发展，很值得地方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去探讨。当然，它只是江西文学的一律现象，决非唯一现象。事实上有许多全国著名的大作家，甚

至某一时代的文学旗手，也并不出在这样的作家网中，象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等就是如此。

从文学的风格流派来看，两宋文学最大的流派是北宋的江西诗派和南宋的爱国诗词派。列入这两大流派的江西作家为数甚多。在江西诗派中，黄庭坚是创始人，被尊为“一祖三宗”的一宗。列入这个诗派的有：谢逸、谢枋、饶节、徐俯、洪朋、洪刍、洪炎、曾几、曾絃、曾思等，他们不全是北宋人，有许多是南宋人。这是影响全国达八百年之久的规模大、时间长的大诗派。直到晚清以黄庭坚的同乡陈三立等为代表的宋诗派（即“同光体”诗人）还荡漾着它的余波。这个诗派的诗人作诗论诗，多强调活法，推崇瘦硬的风格，尤其是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要求“无一字无来处”。这种理论和主张要求非常高，只有少数知识渊博、学贯古今的大诗人才有可能做到；对于大多数诗人来说是想学而学不到，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活”不起来，无法“换骨”，更不能“点铁成金”，于是就往往从古人诗中移置而来，只要做到字字有来处也就自觉不自觉地难免不出现过去评论家认为的“剽窃”恶习。过去有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往往抓住这点给这个诗派冠以“剽窃”和形式主义的帽子，给予全面否定。这其实是失之偏颇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左”的文艺思潮又长期统治文坛，更是彻底否定之，使得这个诗派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不公正的冷遇地位。这个诗派提倡学杜甫，也注意到内容，要求学国风，学楚辞，开拓诗境，反对庸俗，强调语言独创等，都是有积极意义的。黄庭坚的诗虽好奇尚硬，但他能去陈反俗，不作色情之歌，无靡靡之音，却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这个诗派是不应全盘否定的，轻易冠以“剽窃”，冤枉了许多诗人，是应澄清的时候了！不可否认的是，由

于这个诗派自身理论和主张的缺陷，除少数作家，即三宗的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外，多数作家未能也不可能取得很高的成就。要取得较高成就，除非跳出来，摆脱这个诗派的理论和主张，独创一家，象杨万里那样。杨万里初期也是学江西诗派，后来才转变风格，逐渐自成一家，成为“诚斋体”，而为南宋最大、最高产和独具特色的诗人之一。

江西另一大流派是南宋的爱国诗词派。爱国诗派的旗手是陆游，爱国词派的首领是辛弃疾，他们都不是江西人，尽管辛弃疾在江西生活了二十来年，但毕竟不好说是江西人。但江西作家列入这两个派别的却特别多。前者有：王庭珪、谢枋得、文天祥等。后者有：向子諲、洪皓、胡铨、袁去华、杨炎正、刘过、刘仙伦、邓剡、刘辰翁等。这个爱国诗词派是南宋文学的主流和正宗，在江西文学中尤其是如此。他们中不少人是抗金抗元斗争的参战者和指挥者。因而他们的作品都有真挚实感，豪迈奔放，慷慨激昂，处处流露着抗战的决心和意志。但也不可否认，他们在朝廷昏愤、奸臣当权而不得志，甚至受到迫害时，也不时流露出报国无路及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可贵的是当元朝统治全国后，他们中的健存者仍坚持抗元斗争，写下了不少抗元作品，被称为宋遗民诗词，如刘辰翁等。这个派别的作家作品，历来肯定的多，但也有不少在艺术上受到指责，认为不合声律，粗率平直，过于散文化、议论化等。这些指责有的是合理的，指出了这个词派的缺陷，有的则是过于苛求，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个诗词流派确实留下了许多金剛般的作品，至今不减它们的光芒。如袁去华的两首《水调歌头》（“雄跨洞庭野”和“笔阵万人敌”），刘过的两首《六州歌头》（“中兴诸将”和“镇长淮”）以及《沁园

春》(“斗酒萸萸”),刘仙伦的《念奴娇》(“吴山青处”),邓剡的《念奴娇》(“水天空阔”),刘辰翁的《柳梢青》(“铁马蒙毡”)和《忆秦娥》(“烧灯节”)等词;王庭珪的《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谢枋本的《初到建宁赋诗一首》,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等诗,都是爱国诗词派的传世佳作。

至于格律派词人姜夔和张辑,尽管他们不图仕宦,好游浪,通音律,懂古乐,善书法,然而他们的作品多辞工而意穷,带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远离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之外,多寻求个人情感的抒发。虽然有时他们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甚至还和过辛弃疾的原词,但与他们个人私情的抒发相比,显然是太微弱了。

格律词派的创始人是北宋钱塘人周邦彦。姜夔继承和发展了周邦彦的风格,成为南宋最集中的格律派词人。他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既未作过官,又不是隐士,且好与权贵结交,但不趋炎附势。他学识渊博,才华过人,不仅是文学家,又是音乐家,作曲和演奏都很擅长。他既能自制新词谱,又能改正旧调,一生自制新词谱十七支,如《扬州慢》、《暗香》、《疏影》等。他填词很注重语言工力,用词精微深细,造句圆美醇雅,因而语言优美,音调和谐。他的词确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可惜的是内容空虚。如他二十多岁时作的《扬州慢》(“淮左名都”)就是他的杰作。超众的才华,工炼的笔力,高度的技巧,熔为一词,只是缺乏振奋人心的力量,并流露出消极情绪。他的《暗香》和《疏影》也有很高的技巧,为历代传世名作。一言以蔽之,姜夔的词语言美,技巧高,但反映的生活面较窄,过于追求形式。张辑是姜夔的同乡,又是姜词的后继者。他放浪江湖,终生未仕,经历和词风都很象姜夔,成为格律派词人之

一。他有时也学苏、辛，只是不如学姜夔那样得心应手。他们对后人都曾产生较大影响。

从文学作品的样式来看。这是江西历代文学样式最多、最活跃时期。除戏曲外，各种文学样式都得到繁荣。诗比唐更发展，更有成就。全国诗的黄金时代是唐，宋诗显然不如唐诗。但江西却不然。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在唐代，江西的诗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恐怕不独是江西，江南好多省（除江苏、浙江外）也有相似之处。在唐代以前，北方（主要指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文化比南方更发达，直到安史之乱后和五代十国时期，北方长期处于混战状况，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速度才开始超过北方。所以江西的诗，宋比唐更发达，成就也更高，这与全国情况不同。江西历代最大、最有成就的诗人，除陶渊明出在东晋外，几乎都出在两宋，如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文天祥等。他们不止是江西的大诗人，也是全国著名的大诗人。

词，更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其发展规模和创作成就，在宋代无论江西或全国，都是空前绝后的。这点江西与全国相同。江西的词，虽然起步比全国晚，但发展速度却不慢。就其词人才华和作品艺术高度来说，晏殊应是北宋第一位大词人，应名列于福建崇安的柳永之前。按唐圭璋先生的考证，柳永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卒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见《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那么，柳比晏长四岁，他们应是同时代人。晏殊七岁能文，以神童荐于朝廷，宋真宗召他与进士千余人并试于廷，他神气不慑，援笔立就，众人无不佩服，真宗大加嘉赏，赐同进士出身。而柳永多次应试不第，直至四十八岁才中进士。柳永的贡献主要在于发

展了词的长调，以及开创了词的俚、雅之分，创作一大批用生动俚俗语言反映中下层市民生活面貌、和传统的雅词相抗衡的俚词。这是需要勇气的。晏、柳二人虽然都各自成一家，在词的内容上却没有什么开拓性的发展，尚未突破“词为艳科”、内容多为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藩篱。甚至连欧阳修这样的文坛领袖人物也未能摆脱这种羁绊。只有苏东坡在这方面才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就总体而言，晏词的艺术水平要高于柳词。

北宋词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开拓性强，艺术性高。其代表词人是柳永、晏殊、欧阳修、苏东坡、秦观、周邦彦；南宋词的突出成就在于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结合，而以思想性强、内容丰富为主，尤其是爱国词派的作品。所以宋词的发展高峰又在南宋。在这方面，江西的情况更为突出。在北宋词坛上，颇有声望的江西词人只有晏殊、欧阳修和晏几道三人，且均缺乏开拓性。而南宋著名的江西词人却为数可观，尤其爱国词人特别多。如果单从艺术性讲，也许他们不如北宋词人，但艺术成就的高低不能只决定于艺术技巧的高低，而主要体现于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的程度。所以，尽管南宋江西并未出现晏殊、欧阳修那样的大词人，但就总体的成就而言还是超过北宋的。

两宋江西文学，除词和全国一样高度发达外，小说和笔记是极为活跃的文学样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全国成就最高的省之一。自相传为晋代陶渊明所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十卷）到五代王定保的笔记小说《唐摭言》（十五卷），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进入宋代以来，首先是乐史继承了唐人传奇传统，创作了传奇小说《广卓异记》、《诸仙传》、《商颜杂录》等两百余卷，其中《绿珠传》和《杨太真外传》流传较广。尽管在艺

术上还存在不少缺陷，但毕竟是宋人最早的传奇小说。随后，笔记和笔记小说便很快地发展起来，先后出现了大量的作品，主要有欧阳修的《归田录》（二卷）、孔平仲的《孔氏谈苑》（四卷）、僧人惠洪的《冷斋夜话》（十卷）、洪皓的《松漠纪闻》（今传二卷）、朱弁的《曲洧旧闻》（十卷）、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十八卷）、洪迈的巨著《夷坚志》（四百二十卷，今存二百零六卷）和《容斋随笔》（五集七十四卷）、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十八卷）、陈郁的《话腴》（一卷）、张世南的《游宦纪闻》（十卷）、罗烨的《醉翁谈录》（二十卷）等。即此可见此类作品之多。其中最突出的是洪迈的《夷坚志》，今存卷数只相当于原本的一半左右，就已达一百一十九万字，相当于一部《红楼梦》。其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确是全国绝无仅有的。这种笔记和笔记小说，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小说、散文、也有杂文、随笔，有宫廷秘闻、神怪故事、奇闻杂录、人文轶事、历史掌故、人物评价、诗文考评以及市民生活描写等。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在宋代三百一十多年的历史中，江西的女子文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数、作品既多，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闻名全国的女词人魏夫人，实与南宋的李清照、朱淑真相颉颃。有关她的情况，现在资料不多。因她是江西人、宰相曾布之妻，封为鲁国夫人，人称魏夫人。有人认为她名玩，字玉汝，也有人说名字失传。据台湾《大陆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十五卷第一期潘寿康文章《朱淑真的籍贯和生年考》考证，魏夫人生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卒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大致是可信的。可见魏夫人还早于李清照和朱淑真。朱熹曾经认为，在宋代女子之中，能文的只有魏夫人和李清照二人（见张宗楠

辑《词林纪事》卷十九)。这话虽不一定确切，但说明魏夫人当时在文坛上是颇有声名的。她的作品今存不多，有诗一首，词十四首，其中尤以《江城子》、《捣练子》、《菩萨蛮》最为脍炙人口。此外，还有王安石的妹妹王安娘和女儿蓬莱君也是诗人。武宁的戴复古妻、金溪的何师祖，德兴汪彦章的女儿汪氏，高安陈仲微的女儿陈梅庄均有作品传世。她们作品多寡不一，成就高低不同，但她们都生活在江西的土壤之中，为发展江西文学作出了贡献，无疑应该受到后人的尊重。

为什么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能有这样高度的繁荣和发达，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国家的统一，局势的稳定，农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兴旺，经济的上升，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本来高度发达的唐汉封建帝国，自安史之乱以后，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尤其是北方，是战场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而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两百年来之变乱局面，使全国得到统一，各行各业都相继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学也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这是属于一般的规律问题。

其二，南北发展速度出现了转换的情况。安史之乱以前，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北方发展的速度远比南方快，尤其文化的发展，南方远远落后于北方（江苏、浙江除外）。由于长期的战乱北方所遭破坏远甚于南方，南方在北方处于战乱中心期间则相对地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不仅赶上并且超过了北方。而江西的基础弱于江、浙，潜力大，所以发展速度尤为显著。

其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有利于南方文化的

发展。五代以前，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直在北方，南方许多地方，如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一直落后，有不少地方是被贬官吏充军流放的地方，江西比江苏、浙江落后，但比江南其他省又稍居先进。六朝虽建都建康，只短时间给江浙带来发展，对南方其他省影响不大，而且累计时间才三百三十年，正当稍有发展，政治中心又转到北方了，至于经济、文化，历来中心在北方。正是由于江西落后于江浙，略胜于其他南方省，所以宋统一后，南方经济发展，首先是江西，其速度也快于别省，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心的南移，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出现了文化中心南移。北宋后期，北方金人的掠夺，长期的战乱，不仅政治、经济、文化也破坏的厉害，而南方仍处在发展之中，于是更加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南移。南宋南渡后，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南移，从而有利于南方文学，尤其是江西文学的发展。

其四，北民南移，将北方先进文化带到了南方，直接推动了南方文化的发展。北方长期处于战争破坏和北方贵族的掠夺，而南方却经济发展，市场繁荣，于是大量北民南移，尤其是北方的有正义感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南移，直接带来了北方先进文化，对南方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江西有些宋代作家就是南移的北方知识分子。

其五，江西的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进入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直接领导和带动了江西文学的高度发展。北宋初期和中期，江西在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先后出现了三大宰相：晏殊、欧阳修和王安石。他们本来就是大作家，一旦高官厚禄，大权在握，仰慕的文人学士便成群结队，争相效仿，互相提携，文学的发展就如顺水行舟，一往直前。他们三位宰相本

身就是如此，王安石出身欧阳修门下，欧阳修又出自晏殊门下。江西的这种现象在全国是不多见的。不少以血缘关系形成的作家网也与此关系密切。

四 元、明时期

这是江西文学的相持时期。它包括元、明两代三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这时期突出的发展是戏曲。元曲明剧是这时期最高成就的代表。代表作家是全国著名文学家和剧作家汤显祖。元、明江西文学的一大特点是出现了文学发展的分裂现象。就戏曲来说，是发展的高峰时期；就诗来说，是相持偏低时期；就词来说，是衰落时期；就小说和笔记来说，是下降时期。总之这个时期，江西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现象。

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元曲和杂剧。以关汉卿为旗手的元曲杂剧是整个元代文学的主流；正宗的诗，已降到次要地位。杂剧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康进之等名家高手。这方面江西显然是幼弱的。但在散曲（包括套曲和小令）方面，江西的刘时中、周德清、赵善庆、汪元亨都有不少优秀作品传世。尤其是刘时中的套曲《端正好·上高监司》是历时名作，是元曲中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元曲中，歌咏风月离情的作品较多，直接反映社会问题的不多。而这组套曲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它及时表现社会的重大问题，褒贬政绩，针砭时弊。作品反映了在严重灾荒中江西人民贫苦生活的惨状，谴责了豪户大商趁灾打劫的罪恶行径，真实地再现了元代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是作者的代表力作。周德清不仅有不少优秀作品，如《中吕·满庭芳》中的《看岳王传》和《误国贼秦桧》两首等，他还总结了北曲用字用韵的规律，著有《中原音韵》一书。